

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庞卓恒摇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前摇摇头言

唯物史观 按恩格斯的定义 ,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它证明 ,人类自身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 ,必然要推动自身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从而也就必然要推动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而且都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这是全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它的这一基本内核决定了它是指引全人类走向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的科学 ,同时也是指引历史学乃至一切社会科学成为真正科学的指针。

作为指引全人类走向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的科学 ,虽然它本身是从以往的人类历史进程的实证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科学认识 ,但又必然要接受现实的历史进程的检验。因为人们总是首先根据现实的体验来判断某种学说是非得失的 ,只有从现实的体验中感受到某种学说与他体验到的现实吻合时 ,才会接受那个学说。

当前 ,唯物史观在现实的历史进程的检验中 ,面临着它诞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这主要是因为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自本世纪初取得第一个伟大胜利——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以来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突飞猛进的发展 ,到本世纪 70年代把它的胜利旗帜插遍了地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 ,而到 80年代末和 90年代初 ,却似乎突然地急转直下 ,出现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大回转。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它诞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挫折。与此相对照的是 ,资本主义世界却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重重危机中摆脱出来 ,显示出了新的生命活力。面对着这样的世界历史进程 ,一些本来就对唯物史观存有偏见的人们 ,更加振振有辞地宣称 ,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本来就是“神话” ,现在已被事实宣告了它的“彻底破产”。一些本来还有些相信唯物史观的人们 ,面对着这样的世界历史进程 ,也难免对唯物史观产生了种种的疑惑 :它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果真与客观历史进程相符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真能代替资本主义吗?历史的发展演变真有什么必然规律吗?……这就是我们在社会历史观的根本理论上面临的挑战。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唯物史观作为指引历史学成为真正科学的指针 ,它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也随之而引起种种疑惑 :历史学真能成为具体揭示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社会形态从

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理论、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真能指引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吗？唯物史观果真是指引历史学健康发展的唯一科学的理论吗？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成果不是也有许多新的进展吗？半个多世纪以来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滞缓的原因，以及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等等方面的问题，不是至今未能得出比较公认的答案吗？……这是我们今天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具体的历史研究中面临的挑战。这种挑战不同于前一种挑战，或者说只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面临的实际问题，但却都是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

面临严峻的挑战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于真正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们来说，肯定是好事。因为挑战可以转变为机遇。唯物史观面临的严峻挑战，正是在现实中对唯物史观加以再认识、再发展的大好机遇。唯物史观本来就是在回答现实的挑战中诞生的，也是在不断回答现实中提出的新的挑战中发展的。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对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面临的实际问题试图作出某些回答的一个尝试。

我们的回答从唯物史观的再认识开始。唯物史观自诞生以来，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经过了几代先贤的阐释。每一代先贤都是根据他们当时体验到的现实生活和所能吸取到的历史研究成果作出相应的阐释，阐述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认识到的真理。如今，世界历史进程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轨迹和新趋势，历史研究也获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成果。面对着这些新轨迹、新趋势和新成果，特别是面对着唯物史观面临的新挑战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新挑战面前面临的实际问题，对唯物史观加以再认识或再阐释，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这种再认识或再阐释不能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否定，否则就不成其为再认识或再阐释，而只能叫做再否定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已经被无数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是有些人由于种种阶级或社会的屏障遮住了视野，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它的真理本质罢了。因此，我们所说的再认识或再阐释，只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基础上的再认识或再阐释。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任何的再认识或再阐释都必然带有尝试性，需要经过反复的颠扑、争议或磋商，才能达到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

本书的甲编，题为“唯物史观的再认识”，共分缘章，主要是对与历史研究直接相关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阐述，如：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究竟是什么规律？马克思本人在阐述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形态理论时，早期、中期和晚期是否自相矛盾？怎样理解“三大阶段”、

“五大形态”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否不成熟？怎样理解历史的“跨越”和“回转”？本书在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时，力求把 1949 年代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56 年代的《经济学手稿》、1959 年代的《资本论》、1960—1961 年代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以及有关书信，贯通起来求索和阐释。我的专业并非哲学，自知在这个领域有难以避免的专业局限。只是因为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在它遇到严峻挑战的时刻，感到十分必要有所回应，才不揣冒昧而行此举。而此举的目的也主要是提供方家时贤参酌批评，同磋共研。

本书的乙编，题为“唯物史观与中国史研究”，分别就史学界长期争议的几个问题——关于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制阶段问题或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中西封建社会延续时间长短悬殊原因问题、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滞缓原因问题、中西历史文化比较问题——阐述了与唯物史观的再认识相关的一些看法。作者自知，中国古史也并非自己所专攻，只是在中西历史比较研究中涉入这个领域，也难免有专业上的局限。我提出这些看法，同样也主要是提供方家时贤参酌批评，同磋共研。

本书的丙编，题为“唯物史观与当代西方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概述当代西方史学的进展和困惑，着重阐述二战后兴起的西方新史学的积极成果及其局限性和面临的新困境，同时对“二战”以来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演变做了概述和评说。事实证明，对待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成果的唯一可取的态度，就是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本编力求以这样的态度来阐述。这里也涉及到广泛而复杂的哲学和史学问题，同样难免有粗疏欠当之处。

总之，这是一部提供学界同仁参酌、批评的著作。我由衷地期待着各方学友的批评指正。

在此，我特别要对学术界一些年轻朋友表达我的谢意。书中部分章节的基本内容，作为本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曾在前些年发表过。我由衷感谢这些年轻朋友认真阅读它们，并以不同方式向我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有的还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当我着手把那些阶段性成果汇入本书时，那些宝贵意见促使我对以前发表过的看法重新作一番审视，弥补了一些疏漏。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本书也是我十余年间教学内容的一次总结。跟我研习研究生课程的历届年轻朋友，在我们的争辩式课堂上无所顾忌地提出各种不同看法跟我争辩，这些争辩促使我更深入地去思考和探索，实在受益匪浅。正因为此，我特别希望年轻朋友们继续对这本书的内容提出宝贵的批评或商榷意见。

我还要特别感谢对本项研究的立项给予了宝贵支持的评审专家,感谢中华社会科学基金会给予的宝贵资助。本项研究的前期工作,曾得到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资助,在此也表示由衷的感谢。我还要特别感谢对本项成果进行鉴定的专家组的各位专家:龚书铎教授、齐世荣教授、夏自强研究员、陈宴清教授、陈振江教授、金刚教授和王方宪编审。各位专家的宝贵意见,为书稿的修改完稿提供了重要启导。

最后,还要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学术著作出版极为困难的今天,全靠他们的慷慨承诺,才使这本书得以面世。

庞卓恒摇 员 怨 苑 年 员 园 月 初 稿

员 怨 愿 年 员 园 月 修 改

志于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与发展研究所

目摇摇录

甲编摇唯物史观的再认识

第一章摇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员
第一节摇偏颇、诘难和困惑	员
第二节摇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愿
第三节摇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	员远
第二章摇历史发展规律的再认识	圆猿
第一节摇什么是规律	圆猿
第二节摇什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猿
第三节摇规律中的客观限定性和主体能动性(上): 社会历史阶段的不可跨越性和可跨越性	源苑
第四节摇规律中的客观限定性和主体能动性(下): 自然条件的制约与人类控制自然界能力的发展	缘
第五节摇历史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	缘
第三章摇殊途同归的东西方历史路向的求索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意义	远源
第一节摇怎样追寻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本义	远源
第二节摇联系《草稿》看《序言》	远苑
第三节摇马克思怎样看待当时的东方社会	远猿
第四节摇远年代以后马克思笔下的东方社会	苑
第五节摇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启导意义	苑
第四章摇从多样性探寻规律 ——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启示	愿缘
第一节摇探索的背景和目的	愿远
第二节摇未有终结的求索	怨源
第五章摇历史发展动力的再认识	员圆
第一节摇“最后动力”、“直接动力”和“合力”	员圆
第二节摇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的历史过 程看历史动力	员圆
第三节摇怎样看待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	员源

乙编摇唯物史观与中国史研究

第六章摇唯物史观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员圆
-------------------------	----

第一节 摇历史的回顾	页四
第二节 摇从百家争鸣中逐步取得共识	页六
第三节 摇怎样看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阶段和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变革	页六
第七章 摇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滞缓原因	
因的探索	页九
第一节 摇因果关系的困惑	页九
第二节 摇中西封建社会劳动者物质生产能力发展历程的比较	页九
第三节 摇根本原因和多种因素的作用	页九
第四节 摇历史对现实的启示	页九
第八章 摇中西历史文化比较及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页九
第一节 摇第一次高潮的回顾	页九
第二节 摇世纪末的高潮·与世纪初的比较	页九
第三节 摇历史文化比较的理论、方法论探讨	页九
第四节 摇文化观、方法论与实证比较	页九
丙编 摇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第九章 摇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	页九
第一节 摇唯物史观激起的反响	页九
第二节 摇西方传统史学的危机和新史学的兴起	页九
第三节 摇新史学的勇猛推进和踟蹰徘徊	页九
第十章 摇面临二难抉择的历史哲学	页九
第一节 摇哲学和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 的历史哲学”	页九
第二节 摇唯心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对峙	页九
第三节 摇回避不了的本体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	页九
主要参考书目	页九

甲摇摇编 唯物史观的再认识

第一章摇摇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 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第一节摇摇偏颇、诘难和困惑

按我们通常的理解,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这样理解固然不错。可是,什么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呢?常见的说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这样说,从原则上看当然也是对的。可是,再进一步追寻,是什么力量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向前发展呢?种种的答案就常常引起困惑。例如,如果说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向前发展,那么,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的呢?回答就只能说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的。这样就陷入了“你推动我,我推动你”的循环圈。另一种可能的答案是说,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向前发展的。可是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呢?一种回答是说,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的。这样一来,又回到“你推动我,我推动你”的循环圈去了。

还有一种回答说,生产力的发展是人和自然的矛盾推动的。这种回答确实触及到了真理的根蒂了,因为由此再往深处推进一步,就势必要问,为什么人和自然的矛盾就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呢?由此就势必要回答说,因为人类要吃、喝、住、穿,就必须克服物质生产中的困难,就必须不断积累经验,增长生产能力和知识,这样就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比较明晰的回答,可以避免陷入“你推动我,我推动你”的循环圈。

由此就应该作出结论:人本身,或者说,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本身,是推动生产力以及整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最终动力。本来,这就是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

普遍规律。因此,恩格斯把唯物史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①。

恩格斯不但把唯物史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而且还把唯物史观和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称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②。认真理解这些介说的含义,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唯物史观的真谛。

可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一些阐释唯物史观的论著往往忽略了这些至关重要的介说,在阐释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或历史发展的动力时,不知不觉地忽略了动力就来自人本身——或者说,来自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本身——而着重强调“矛盾就是动力”,或“动力来自于矛盾”;在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时,往往忽略了它就是人本身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同时也是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推动自己本身的能力和素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主要强调它是由种种“矛盾”推动和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样一来,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含义就不知不觉地被忽略了。历史发展规律就成了“矛盾”或“社会形态”自身的运动规律,人本身反而只是那个运动规律的“载体”了。

这样的偏颇理解,无论是用于指导现实的实践,还是用于指导社会—历史科学的研究,都往往导致简单化、机械化和教条主义的不良后果。

汝信同志在《关于历史哲学两个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过去我们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在某些地方确实有简单化、机械化和教条主义的倾向,这些倾向妨碍了对这个问题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同时也在理论上留下了漏洞,给人以可乘之机”;“比如说,过去在谈论历史规律时往往片面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过分强调它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而忽视了它和人本身的特殊关系”。汝信同志还指出:“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过去曾被视为‘禁区’,一直是我们的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这两年来情况有所转变,但许多问题的探讨还刚刚开始。我觉得,对于历史哲学来说,人的问题尤其重要,很有必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在这方面开展研究和讨论”^③。

我觉得,汝信同志指出的问题,是十分中肯并切中要害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本书所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如为此版本,下文出现,不再一一注明。)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00 页。

③ 汝信:《关于历史哲学两个问题的思考》,载《世界历史》1985 年第 1 期。

的确,由于对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自然历史过程”作了片面的理解和阐释,给我们自己留下了一个不小的理论上的漏洞和许多的困惑,同时也给反对唯物史观的人留下了振振有辞的口实。

在当代,从理论上对唯物史观和它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加以诘难和抨击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波普尔(运朝召)提出的反论。他像许多反对者一样,把唯物史观和它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曲解为命定论式的“历史决定论”。为此,他特地选用了“~~历史决定论~~”这个词,来指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论,专门写了 ~~裁藻子精副增案~~ 一书^④,来抨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论。波普尔在该书中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与宗教神学的天命论、宿命论和法西斯主义的种族决定论混为一谈,全都称作“历史决定论”,一起加以鄙弃。他为此还特别在该书扉页加上一段引人注目的题词,申明该书是“为纪念那些沦为所谓历史命运的不可抗拒的规律的法西斯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牺牲品的一切教派、民族和种族的无数男男女女而作”^⑤。

波普尔创造了一个“五段论”来“证明”历史根本无规律可言,并由此断言“历史决定论”必然“崩溃”。他的“五段论”就是:

“~~人类历史的行程受到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我们不可能用理性的或科学的方法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未来发展。……~~

~~因此我们不可能预见人类历史的进程。~~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否定……建立像理论物理学那样的历史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不可能有一种为历史预见提供依据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

~~因此……历史决定论已走向崩溃。”^⑥~~

④ 该书中文版即杜汝楫、邱仁宗译,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另有何林、赵平译,波普尔著:《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在西方用语中,~~历史决定论~~一词是一个多义词,既指宽泛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如西方学者一般用以强调历史与现实的根本区别和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根本区别,或强调每个历史现象的独特性和不重复性),还特指“历史决定论”,即认为历史按一定的规律演变的理论。波普尔完全是在特指意义上使用该词,因此,该书中的“~~历史决定论~~”一词,译为“历史决定论”较为确切。

⑤ 这段扉页题词在杜汝楫、邱仁宗译本中没有译出,何林、赵平译本中的这段译文难以读通,故按该书英文版(~~裁藻子精副增案~~,~~译世社~~)重新译出。

⑥ 参见波普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第 1-4 页;波普尔著、何林、赵平译:《历史主义的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1-102 页。此处译文参照英文版原著作了调整,见 ~~裁藻子精副增案~~,~~译世社~~ 1986 年 X 页。

这个“五段论”的逻辑谬误，我们留待后文剖析。这里须着重指出的是，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论与宗教神学的天命论和法西斯主义的种族决定论混为一谈的手法，确有一定的迷惑力。波普尔显然是利用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过的一些令人痛心的错误，特别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曾以“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的代表者自居，发动过以强制手段强迫人民群众“顺从历史规律”的蠢事，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过很大伤害。波普尔利用那些蠢举在人们心灵中留下的伤痛，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宗教神学的天命决定论和法西斯主义的种族决定论混为一谈而加以诋毁，其迷惑力确实不可低估。而我们对“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的某些理解和阐释上的缺陷，是不利于消除那种迷惑力的。

应该承认，在如何阐释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人们的主体意愿的选择性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着缺陷，或者说存在着理论上的困惑。例如，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历史进程有时顺应着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前进，有时又逆着那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前进，而顺着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前进。于是就说，这正好证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的，你的意愿顺从了它，就能成功，不顺从它，就必然失败。总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要自行其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样解释似乎说得过去。可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历史进程不是顺着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朝着前进的方向演进，而是顺着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朝着逆转的方向演进。这又作何解释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说，历史中有前进也有逆转，这本来就是历史的辩证发展规律。可是这并未回答为什么会前进或逆转。这种解释无异于说，“因为它的本性就是那样，所以表现出来就是那个样子”。另一种解释是说，前进是必然的，是主流，是合乎规律的，逆转是偶然的，是支流，是暂时脱离规律的轨道，迟早是要回到规律的轨道上来的。可是，“规律的轨道”既然可以按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而脱离开去，它还能叫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吗？

在当代，对唯物史观和它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加以曲解和诘难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克斯·韦伯（~~马克思·韦伯~~）的反议。他以一些似是而非的“事实”为依据，断言唯物史观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他称：“只有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才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甚至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精神的典型体现者也不是利物浦和汉堡的那些风度翩翩的绅士（其商业财产是世袭而来

的),而是曼彻斯特和西法利亚的那些多在非常普通的环境中靠个人奋斗而发财致富的暴发户。早在十六世纪,情形就颇为相似了,那时兴起的工业多是由暴发户创建的” ;“同样无疑的是,在与新英格兰接壤的某些殖民地以及较后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南方各州,资本主义远没有如在新英格兰地区那么发达,尽管这些殖民地及州是由一些大资本家出于商业动机建立的,而位于新英格兰的各殖民地则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由传道士、神学院毕业生在一些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这里的因果关系正好与按唯物主义观点得出的因果关系相反”^⑦。关于韦伯的这些论证的逻辑和史实谬误,我们也留待后文剖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显然是把唯物史观所说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这样一些概念曲解为处于人们实际的生活过程之外的某些外在的经济条件,或自身的实际生活过程开始之前的某些既定的物质条件,诸如世袭财产或原有资本是否雄厚之类的客观条件(唯物史观肯定前代人遗存下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对每代人的实际生活过程有重大影响,但每代人终究要以自身的实践活动改变那些条件),而不是人们自己的生活实践过程本身,于是,当他发现有的人或有的地区世袭财产或原有资本虽然雄厚,却缺少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反而是那些起初并不富裕却有强烈的依靠个人奋斗发财致富欲望的人们,体现着他所说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这样他就认定他已经证明唯物史观颠倒了因果关系。韦伯这种手法,也有不容忽视的迷惑力。我们在这方面的某些理解和阐释上的缺陷,也是不利于消除那种迷惑力的。

应该承认,在如何阐释存在与意识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着缺陷,或者说存在着理论上的困惑。例如,费尔巴哈曾说:“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⑧。这段话往往被误认为是对存在决定意识原理的形象表达。这样一来,“存在”就被理解为人们的外部生存条件或生活环境,而意识不过是外部生存条件或生活环境的反映。韦伯显然正是利用了这种误解来抨击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的确,这种反映论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生活在茅屋里的人,有的想推翻皇帝,有的却想做皇帝的忠诚顺民,有的还自己想当皇帝;同样生活在皇宫中的人,有的想维护皇帝和皇帝制度的特权,有的却同情受压

^⑦ 马克思·韦伯著,于晓、陈维刚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年版,第 145-146 页。

^⑧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引用了这句话,接着指出:“但是,费尔巴哈完全不知道利用这些命题,这些命题仍旧是纯粹的空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46 页)。

迫者,甚至加入了受压迫者的造反行列。这种理论确实应该摒弃。但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而是机械反映论。马克思所说的“存在”决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指人们自身的实际生活过程:“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⑨。因此,唯物史观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实际上是说“生活决定意识”;甚至可以说是“实践决定意识”,因为唯物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当然,唯物史观的实践观并不否认任何实践都是在既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开始的。它承认那些既定条件的“先在地位”。但是,归根到底,先在条件总是要被人们的实践活动改变的。唯物史观所唯的“物”,并不是人们实际生活过程之外的物质经济条件或任何先在条件,而是人们本身的“物质实践”。因此,它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与机械唯物论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某些阐释却忽视了这一根本区别,由此引起了理论上的一些困惑。而这些困惑又同我们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解上的困惑有联系。

我们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这无疑是对的。什么是生产力?我们理解为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或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两要素)的结合,而劳动者是其中的关键要素。原则上这也是对的。我们把生产关系理解为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原则上这无疑也是对的。可是,在进一步的理解和阐释上却遇到了困难。例如,怎样衡量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呢?作为三要素或两要素结合的生产力,很难从数量上衡量。于是有的论者就认为只能从性质上衡量。可是,什么是生产力的性质呢?那就看它是手工劳动还是操纵机器劳动。那么,既然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又怎样解释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都建立在同样的手工劳动的生产力水平上呢?而且,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完成产业革命以前两百多年间,已经在一些地区以分散或集中的工场手工业的形式和手工操作的雇工农场形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又作何解释呢?还有一个更难令人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能够在手工劳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一些国家建立起来,而在实现了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生产的发达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0-242页。现在有一种气氛,觉得大量引证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就有教条主义之嫌。我要请求读者谅解的是,我在本书中所作的大量引证,正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我请求读者耐心读一读我的引证,最好参读原著,再作判断。

资本主义国家至今还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我觉得,这些困惑之所以产生,除了历史背景上的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外,理论上的一个带根本性的误解或忽略是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唯物史观本来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⑩;它所说的历史发展规律是指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⑪);它所说的“存在”是指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而不是在“人之外”决定人的命运的外部条件;它所说的生产力指的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⑫,而不是“人”和“物”的机械组合的结果;它所说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各种关系、结构、体制和制度,都是人们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且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改变、发展而相应地改变和发展,而不是那些关系、结构、体制和制度自己靠着什么“我推动你,你推动我”的“矛盾”推动自己发展。但是,在一些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著述中,不知不觉地把人们的实践活动抽出去了,剩下的只是那些定型化了的的关系、结构、体制和制度,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不知不觉地就成了没有现实的人出场的结构运动,似乎就是那些关系、结构、体制和制度“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在那里自己运动,而且是按照一定的演进顺序在那里运动。其结果就是,在历史和理论的阐述中都出现了正如汝信同志指出的那种情况:“正是人这个创造历史的主体在历史规律中的作用,在过去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在谈历史规律时,人看不到了,这就像演《哈姆雷特》没有丹麦王子上场一样。本来应该体现丰富多彩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无限多样性的历史规律,失去了它原有的诗意,变成了没有血肉的冷冰冰的教条。这种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19世纪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残余”^⑬。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唯物史观和它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一番认真的再研究、再认识。

在本书中,我们的再认识就从为什么说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开始。

⑩ 这是恩格斯的概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4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4页。

⑬ 汝信:《关于历史哲学两个问题的思考》,载《世界历史》1985年第4期。

第二节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摇摇如前所述,在唯物史观的理解和阐释上出现简单化、机械化和教条主义倾向,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含意的忽视,而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发表过专门从原理的逻辑体系上阐述唯物史观的专著。他们对唯物史观的阐述,主要是在同形形色色的论敌们的论战性著作中所作的论述,或具体运用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大量论著和书信中的论述。比较集中地论述唯物史观的若干重要著作,又长期未能公开出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之后,而且恩格斯也已经得出了与马克思“一样的结果”^⑭之后,他们共同写作的第一部相当系统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巨著。但该书只是在 1845 年才第一次用俄文刊载于《马恩文库》第一卷中。又如,《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1868 年草稿)》,马克思本人曾指出:“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⑮。但这部著作只是到 1883 年和 1885 年才用德文先后分两册在莫斯科出版。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唯物史观的大量书信,多是存放了更长时期之后,才收集发表。这样一来,人们很难一下子把握住他们阐发的唯物史观的全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当时和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都是夺取政权和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以那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大都是以论证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和建立公有制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中心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还有,持唯心史观的论敌们长期以来总是在社会历史中的物质性因素与精神性因素的关系方面进行无休无止的纠缠和攻击,促使唯物史观的捍卫者们也就主要从这方面进行回击。这样,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含意就不知不觉地被削弱以至忽略了。

例如,梅林在 1898 年写过一篇《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专论,其主要注意力就是着重回答持唯心史观的论敌们在物质性因素和精神性因素的关

^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47 页。

^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347 页。

系方面对唯物史观的攻击。这篇论著在捍卫唯物史观方面具有历史性功绩。但他在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时,主要着重于阐明“最终还是生产方式决定着精神生活过程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人类精神不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父亲,相反,物质生产方式倒是人类精神的母亲”^{①⑥}。这当然是对的。可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父亲”或“母亲”又是谁呢?他没有回答。

梅林在反驳历史唯心论者把促进社会历史进步的“发现和发明”归结为“有创造性的人类精神”的产物的论点时,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述:“……恰恰是比迄今一切发明不可计量地更能扩展人类力量的那些发明,反而成了使它们的最初发明者送掉性命的东西,而那些发明事实上也在一世纪的时间内或多或少地变得无影无踪了。安东·缪勒约在 1804 年在但泽发明了一种所谓织带机,或称为纽带机或编织机等,可以同时织出四到六块织物,但是城市绅董会恐怕这项发明会使大量工人沦为乞丐,因此禁止使用它,并把发明者秘密地淹死或绞死了。……马堡大学数学教授但尼斯·巴宾的命运与安东·缪勒的命运差不多同样悲惨,巴宾企图造一部工业用的蒸汽机,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反对而灰了心,他结果把机器放下而造了一艘汽船,他在 1806 年乘着它从加塞尔沿富尔达河顺流而下,想航行到英国去。但在明登,明智的当局禁止他前进,维塞尔河上的船夫就把汽船捣毁了。巴宾于是就在英国穷困而死。现在可以弄明白了,1804 年安东·缪勒发明织带机或但尼斯·巴宾在 1806 年发明汽船,是比詹姆斯·哈格利夫斯在 1769 年发明珍妮机,或者富尔顿在 1807 年发明汽船,更伟大得不可比拟的人类精神产物。但前者竟一无所成,而后者则获得了这样的改变世界面貌的成功。这就证明了,发明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恰恰相反,经济发展才会带来发明”^{①⑦}。显然,这段论述不但对于那些把技术、工具的发明单纯归结为精神产物的唯心论者是一个有力的驳斥,而且对于把生产力的发展单纯归结为工具、技术的发明或改进的片面观点,也具有矫正作用。可是,既然“经济发展才会带来发明”,那么,“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什么呢?“经济发展”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促进相应的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生和应用呢?仍然没有答案。

此外,梅林在论述“气候、种族等等那许多物质的因素”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时,也坚持了“劳动的自然条件,……只能通过生产过程在人

^{①⑥}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下同),第 104 页。

^{①⑦}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 104 页。